

2016年9月 第二十一期

# 社聯政策報

## POLICY BULLETIN

### 何謂真 · 香港人？

- 本土思潮的發展
- 誰是真 · 香港人？
- 解構新移民形象及「溝淡論」
- 同工對談：前線觀察及服務反思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 目錄

2	編者的話
3	從本土思潮到自決與港獨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羅永生副教授
<b>分析與觀點</b>	
8	• 真·香港人? 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助理教授王慧麟博士
10	• 也談「香港人」 香港作家 陳冠中先生
13	• 誰是「新移民」？解構五大迷思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蔡玉萍教授、研究助理陳沛雯女士
22	• 「溝淡論」站得住腳嗎？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葉健民教授
26	• 同工對談：前線觀察及服務反思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家庭及社區)梅偉強先生 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跨境及國際個案工作服務總監廖金鳳女士 「中港家庭權益會」組織者曾冠榮先生
30	問卷調查
32	昔日政策報

## 《社聯政策報》編輯委員會

主席 葉健民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成員 鍾劍華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蔡玉萍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王惠梅女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發展專責委員會副主席）  
羅偉業先生（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專責委員會委員）

## 編者的話

近年的政策討論，始終無法迴避中港矛盾這個議題。

在服務使用上，大陸移民是否佔過多資源？簡單「港人優先」原則，又是否能夠完全解決問題？又或者，移民湧入又是否必然會對香港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這些爭論背後隱藏的中港對立觀點，也同時反映在政治層面上。「蝗蟲論」的指控並不局限於資源上的掠奪，也關乎政治上的入侵。這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大陸銳意要透過「人口換血」、文化入侵等手段，試圖令香港最終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失去了原來的面貌。這種憂慮，帶來的政治上的反彈，本土主義，以至港獨思潮，也在這種局面下快速滋長。

今期我們以此為題，邀請了多位名家為我們深入探討這些關鍵議題。六篇文章，環繞著兩個主題：內地移民的面貌與本土思潮。蔡玉萍與陳沛雯兩位為我們釐清有關內地移民的種種客觀處境，以紮實的實證數據回應了社會上對這個群組的種種偏見，為討論奠下一個理性的基礎。我們也訪問了梅偉強、梁友東、廖金鳳和曾冠榮幾位長期參與內地新來港人士支援工作的前線同工，進一步回應了社會上對移民的種種歧視與誤解。我也根據早前的一項調查，討論了內地移民的政治傾向，提出我對移民「溝淡論」——中共透過向香港輸出人口，以加強政治控制的說法的保留。

另一組文章，關乎另一個更尖銳的課題一本土思潮。陳冠中與王慧麟兩位評論家的短文，為我們點出有關香港人身份的種種爭議。前者指出「香港人」的身份不單關乎兩地社群的共同價值，也有意無意流露出一種本地人「崇高幻覺」的自大心態。而後者同樣指出「港人身份」，更多可能源自對中國現象的批判。兩個觀點，超越了當下很多環繞以血緣、法律定義，以至內部價值認同等角度去開展的「真香港人」討論。最後羅永生為我們撰寫的文章，深入回應了香港本土意識的演變和發展，重點提出香港人身份和本土思潮，很大程度上由中國的政治發展和中港關係所主導，政治格局的變化也激發出本地社會不同的回應和求存之道，而所謂本土思潮，以至獨立運動，歸根究底是香港人不信任北京對港政策。

期望這六篇文章，能引發更多深度討論。

政策報編輯委員會主席 葉健民

# 從本土思潮到自決與港獨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羅永生副教授

近十年來，香港本土思潮發展迅速，由本土意識、城邦自治，乃至自決和港獨，社會上出現不少新的政治觀念和主張。無論在文化意識上，還是在政治想像上，本土思潮都為香港的發展注入新的元素。姑勿論我們中間各自對這些變化有甚麼評價，若不了解這些新的思潮變動的演變軌跡，我們實難以掌握這個城市的未來。

當然，香港萌生本土關懷，確認香港人本土身份的過程，並非始自最近。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一種獨特的香港人身份，在英國殖民時期已經冒現，但因為一直以來，自中國南遷來港的移民在比例上遠比久居香港者為高，這些移居者往往對故鄉有強烈的歸屬感，香港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由移居者和過客組成的城市。中國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初發展起來之後，特別經歷過對日抗戰，香港的華人也在故鄉認同之外建立起不弱的國家民族認同，自視為中國人的一部分。而且，統治香港的英國人也沒有刻意以英國文化同化本地人，所以大部分居港的華人都不會質疑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直至戰後，邊境管制和人事登記制度建立起來，有別於大陸中國人的「香港居民」身份才慢慢穩定下來。不過，這種身份區別並沒有立即做成強大的族群差別意識。

## 土生土長一代與香港意識

一直到七十年代，香港社會才出現「土生土長」的一代，當時中國大陸實行毛式社會主義，和香港居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出現巨大差距，本地獨特的文化認同和對香港的歸屬感於是誕生。這戰後土生的新一代以香港為家，也不滿於政治上沒有前景的殖民統治，要求政治參與，發起社會運動。港英政府為了解決華洋衝突，也改善施政，加強服務，並且透過活動和宣傳，建立一種獨特的「香港歸屬感」。可是，礙於中國的反對態度，政府也沒有追隨英國在星馬等地實行的「非殖民地化」政策，讓香港建立民主的體制並取得自治地位。所以香港人當時建立的自我認同感，在政治上並沒有相應的配合。於是，英國維持著她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而且是在中國默許下進行的。

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文教機構，雖然分屬意識形態對立的左派和右派陣營，但都以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方針。香港身份和本土認同被理解為一種地方性的身份，與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民族身份」並不矛盾。這種「中國人」(民族)身份並無一個固定的「國民身份」與之相連，因為世界上的確存在兩

個以「中國」為號的國家。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在想像上認同自己喜歡的「中國」(政府)，或者過去 / 未來的文化中國。所以，香港人的中國身份，由戰後直至九七年都是只有文化和民族的意義，但沒有確定的政治 / 國民意義。同樣地，當時的本土意識也處於矇朧狀態，其根基不在精英階層和精緻文化的層面上得到支持和鼓勵，反而是在庶民生活和普及文化中被廣泛流傳複製，孕育出一種在情感、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上香港人與內地中國人有別，但不一定能說得很清楚的族群差異。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香港人被排除在外。一國兩制的構想，權宜地在「維持既有生活方式不變五十年」的折衷安排下把兩地族群差別的問題打發掉。大部分港人無奈接受「回歸」命運，對中共「接收」的恐懼只能掀起移民潮，沒有發展成抵抗「回歸」的政治運動。不過，邁向回歸中國也使更多港人反思自身的文化經驗，認識香港歷史和此地獨特生活方式的價值，更加珍惜本地制度和文化的優點。而八九年六四的衝擊和九七年的回歸，使香港人打破了冷漠的難民心態，令政治意識大大提高，這種意識與新獲得的中國人身份共生共長，而更因為六四經歷，讓很多人覺得中國與香港的命運緊密相連。他們期望守護著香港未被摧殘的普世文化價值及各種較為優越先進的制度，最終可以幫助改善中國。

但是，當九七過渡，特區政府表現令人失望，中共對香港也多重箝制，求變的訴求漸次產生。零三年七一大遊行抗議廿三條立法，香港人呈現前所未見的團結，表達了強烈的民主訴求，抗拒對既有自由生活方式的干預和規管，也因此令香港與北京直接站在對立的位置上。香港人政治上可以團結，集體發聲，萌生出回歸後首次展現的香港「政治主體性」，以主人翁的身份去主宰自己的城市。不過，當時這種主體性的啟蒙並沒有令香港領導民主運動的政治領袖們挑戰一國兩制安排，也形成不了一項新的政治綱領，因為當時他們仍認為香港可以在基本法框架下逐步實現民主自治。

## 從左到右的主體政治

不過，不消幾年，以本土為號召的主體政治終於出現。與「回歸」歷程一同成長的青年一代(泛稱「八十後」)在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零年間以「本土行動」為名，發起一連串的城市社會運動：由反對天星、皇后碼頭清拆、爭取人民參與城市規劃、古蹟保育、到反高鐵等。這一波由社運推動的本土意識，焦點是放在社區營造以及文化介入，但也深挖出壓迫性政經制度背後的「中國因素」，一是令更多人了解不斷加快的「中港融合」背後潛伏著的危機，「中國因素」亦是令香港愈來愈難保留自己的發展方向和自主的生活方式的原因。這些社運力量也致力於保衛「我城」的歷史記憶，質疑和批判那股跨越大陸和香港兩地龐大的政經力量。

不過，由於支配這些運動的價值大致上來源自廣義的自由主義，承繼了多元主義、去中心、去層級、低度組織的社運左翼，也否定帶有族群主義色彩的政治。所以，這波本土社運並沒有著意於發展一條「本土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綱領。但它們已激活了香港人對自身社群生活內涵的珍視，也展示了從文化和歷

史這些非功利議題入手，同樣可以動員民眾參與社會抗爭，打破了殖民地以來功利主義作主導的政治文化。社運參與者嘗試在政黨之外組織大型的堵路行動，也打破了一直以來泛民政黨和傳統社運人士進行高度自制社會抗爭的慣例。這些行動所帶來的反響，也動搖了泛民領袖過去領導民主運動的威信，使社會運動日益激進化，也開展了對體制的全面批判。

隨後，本土社運發生了重要轉向。一連串影響民生的「中港矛盾」，例如雙非嬰兒、搶購奶粉事件等，本土意識被演繹為「本土優先」的族群政治，形成新一派以本土主義為名的民粹主義動員，箇中包含「保護主義」和「排外」情緒。這一波本土主義在某些方面和前一階段是一脈相承的——例如批判中港權貴階層勾結、以及香港獨特性快將失去的危機意識。但最大的分別在於，支配這些新的以「本土」為名的社會行動是右傾的價值取向。它的主流支持者大都不避諱使用歧視言詞、攻擊維護人權的工作、甚至否定包括平等在內的普世價值。這種右翼的本土主義，與九十年代以來香港人所認為要珍重的「核心價值」——香港的優勝在於它能和普世文明價值接軌——當然是背道而馳的。它們能夠得以滋生和蔓延，根源在於對中共日益加快全面控制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的恐懼。

再者，對於如何面對香港過去三十年由泛民主派領導的反對運動，兩個不同階段的本土思潮，也是既有相同但亦有頗大差異。雖然這兩個階段的本土意識和行動都對泛民領導的民主運動持批判立場，認為需要徹底的更新。但是，對於泛民失敗的原因和該如何找尋出路，兩者就有頗大的差別。城市社運的推動者認為泛民出現的問題是源自落伍的工作方法、狹窄的視野，以及不思進取、墨守成規的老政客積習；但右翼的本土主義則視泛民為敵人，甚至是中共的同路人。他們為瓦解香港出現真正的反對力量而長期佔領反對運動的領導地位，但目的其實只是為中共「維穩」。他們對「泛民」全盤否定，將三十年的反抗運動都看成是騙局，並且將問題化約為「大中華情結」的後果，因而主張以「本土主義」來徹底根除香港政治運動中，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這套本土思潮對沒有經歷過英殖時期、中英談判以及八九六四的新一代甚具吸引力，因為它也借力於世代對抗的論述，青年反叛的動力而助燃。有時候，本土主義甚至被表述為只是世代交替的政治。

## 本土主義的政治運動

但無可否認，在二零一零年開始冒起的本土主義，有著十分明確的政治性，其性質已不再是一種過去三十年來香港熟習的社運，而是一個具有高度意識形態性格的政治運動。可是，本土主義是否真的可以負擔起建構一個全新的政治運動論述，其實並沒有可靠的答案。原因是，本土主義在過去數年以來，主要是以一種策略聯盟的方式出現，以瓦解泛民主派和傳統社運派為主要目的。本土主義訴諸簡單直覺的族群意識，利用對新移民和大陸遊客的不滿來建立民眾的支持，以及爭取共鳴。可是，這終究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運動綱領。所以，當急逼的形勢失去了或緩和了，又或者本土主義的訴求被部分吸納了，本土主義就有失去土壤的危機——除非他們提出更深入和更徹底的分析，並指出出路何在。

過去數年，受到本土主義思潮的挑戰，部分泛民的自由派也的確吸收了一些本土政治的口號和政策。例如，新民主同盟及公民黨等有選擇性地吸收了本土優先原則和爭取新移民審批權等。最近，建制派的工聯會也打出本土旗號，甚至有京官肯定本土的積極作用。本土政治的尖銳性於是突然大幅下降。另外，本土派也憑藉對泛民「和理非非」路線的批判而搶了不少風頭，特別是大型抗爭的高潮，是否突破和平抗爭的限制，幾乎成了識別本土派的標記。但隨著雨傘運動的結束，大型街頭行動的契機過去，而唯一一次出現暴力行動的「旺角騷動」也只是堅持了一個晚上就結束，暴露了暴力抗爭的能力已見極限，不能依靠號召眾人加入「光復」、「起義」而把運動推展下去，暴力革命的呼召也變成空談。但是「和理非」的退場，反而把參與社運行動的大部分市民嚇跑，反對運動整體陷入低潮，本土派也不能說服他人這套本土主義有改變局面的能力，反而說明本土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新論述已達瓶頸，惟有繼續深化才能繼續發展。

雨傘運動之後，為香港追求新的政治運動路向成為政治圈中一個熱門話題。無論泛民自由派、左翼社運分子、還是右翼民粹的網上媒體，都分享著一國兩制崩壞之下如何是出路的焦慮。相對之下，街頭的族群主義衝突性行動因為招來太大反感，亦因為警力鎮壓，已失去了初期的重要性。本土主義無法再進一步，帶領一個可行的運動方向。但自梁振英去年於施政報告特別點名批判港大學生報《學苑》所登載的「香港民族論」專號後，本土派當中原本只屬少數派的「港獨」論述，突然引起全城關注。港獨，變成一個本土主義找尋最新方向的缺口。港獨路線反而在環繞城邦自治論運轉的本土派圈子中，從早一階段在青年網民及大學校園突圍而出。

原來在二零一一年把族群主義風潮帶起的「城邦論」所提出的城邦自治說，本來就伴隨著一套非常詭異的「華夏遺民」說，把「抗中反蝗(蟲)」的激進民粹與內含「大中華」意識的保守主義扭合在一起。青年激進派和一些年資頗長的港獨派對此早有保留和不滿，只是與「共同敵人」的鬥爭把這些矛盾都掩藏起來。而港獨論背後則有一套更強烈的否定中國，另建一香港民族的衝動，城邦論的體系其實容納不下。在港獨被梁振英「炒熱」的情況下，「香港民族主義」便如野火蔓延。因為只有從建構一種最大膽和毫無複雜謀略盤算在內的民族主義論述，才能展示真正有號召力的青年反叛姿態。於是乎，前一階段用以打擊泛民之無力領導，「左膠」社運虛耗民氣的所謂「現實政治」(realpolitik)、權謀計策的套路，開始讓位給充滿熱情感召的民族主義邏輯。

## 自決、港獨與香港民族主義

流風所及，原來不在本土派陣營的社運分子和自由派也積極在廣闊的政治光譜和流轉迅速的政治論述場域中找尋位置。當中認為港獨未必是最正確路向，但又認為要在一國兩制崩壞的絕境中找尋香港主體政治出路的，先後提出過「修改基本法」、「民主自決」、「公投自決」等等構想，也出現民族主義與獨立之間不同的排列組合，例如，有人認為要以香港民族主義為基礎追求香港的「民族自決」，也有

認為獨立不是壞事，但對民族主義則有所保留的，於是也有主張「不以民族主義為本的獨立運動」（蘇格蘭獨立運動模式）以及「自決但不推動獨立」的想法。相比於「港獨」，「自決」的正當性似乎更有廣泛的支持和呼應，公民黨和發起佔中運動的戴耀廷也表示支持香港人有權利追求自決。討論中間也深入探討過香港的自決權利在國際法中應屬「內部自決」還是「外部自決」的問題，這些討論還在進行中。當然，除此之外，新一階段的本土政治運動論述也包含由城邦自治論者不斷修改之後的「城邦建國」／「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的方案。可以說，在這一階段，港獨議題所帶來的衝擊，已經超越了左、右陣營的劃分，產生出多種交錯的新政治想像的可能性。

在年初「旺角騷動」後參加新界補選的梁天琦，象徵了一種從自由派、左翼社運和青年本土激進派可以共同投射某種希望的港獨運動形象，開始擺脫過去數年民粹化的本土主義。他以一個讀哲學的「大學生」形象參選，又身負煽動旺角騷動的控罪在身，予人一種結合了理性和犧牲精神的民族主義鬥士想像。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中，梁振英政府更以禁止宣傳港獨為由取消包括梁天琦在內的多位參選人資格，並且把「反港獨」之手伸向學校，一場來勢洶洶的「反港獨」社會動員已經起步，令港獨不單變成選舉的唯一焦點，也使「港獨」成為一個「被打壓」與「反抗」的象徵，變成任何人都無法躲避的問題。因為現在已經不是港獨是否可欲，是否可行的問題，也不是一個自由社會中公民們透過理性辯論和反思而進行價值選擇和政治判斷的事。在政府的打壓下，「港獨」以及「思考港獨」、「討論港獨」、甚至「對港獨有好奇心」都會成為政府權力干預的借口，任何社會位置上的人都有機會給捲入港獨和反港獨鬥爭的前線。可以預期，社會只會更為聚焦於港獨問題，讓社會更為二極分化。雖然推動港獨的一些青年領袖也公開承認他們不再認為當下勇武鬥爭是可行，但「港獨」亦在云云本土主義主張當中，最有可能成為吸收青年人逆反權力體制能量的旗號。

在近來急劇發展的本土主義思潮中，不論是哪一種口號和方案都預設了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於是投射一個未來抗爭的方向。然而，突破一國兩制框框的想像，無論是自決、公投、港獨、還是歸英，其實主要都是一些烏托邦的構想，所欠缺的是如何操作、如何推展、連結甚麼人、建立怎樣的組織、如何尋求支援等等的實踐問題。港獨所面對的可行性、現實性問題也是最為巨大的。所以一直以來，認真以為這是一條正確路線的人都不多。甚至在初期本土主義的光譜中，港獨也只是少數派。然而，雖然「港獨」幾近天馬行空，但既然北京一意要「以我為主」，無心實現當初提出一國兩制時的種種承諾，也不放心讓民主機制、公民社會以理性來緩解矛盾，讓市民用選票、用辯論來裁決和選擇哪一種是適合香港的政治主張，那「港獨」這符號自然就扮演了作為「超越底線」的「邪惡」角色，被賦予「病菌」、「毒品」等隱喻，以便北京能更理直氣壯的出面干預香港政事，動員各種行政力量，架空立法和司法機關，直接調動社會大眾和民間機構來加入圍剿「港獨」，以誅連和清洗的方式把「疑似港獨」的言論、人物、活動、行為和組織都放進要警惕、抵制、隔離、孤立、監視、禁制的危險異類。這種「反港獨」的「群眾政治運動」，本地版的「麥卡錫主義」政治文化一旦在香港紮根，就會取代香港人在過去數十年建立起來的公民文化。

# 甚麼是真 · 香港人？



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助理教授  
王慧麟博士

本期的題目是真 · 香港人。有真，即是有假。有真有假，中間牽涉到半真半假，真真假假等討論。究竟甚麼是真 · 香港人呢？

筆者是法律人，對香港社會近年討論的「香港人」，其實相當不解。因為在「面書」發帖，討論一下關於香港人的東西，就會出現不同的界定。有些人認為，要分辨香港人與非香港人，不難：用居港七年的方式來界定就方便了，住滿七年就是真香港人了。有人會認為，分辨香港人，最好的方式是看國籍。自然地，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又或者只有特區護照的，亦是香港人。亦有人反方向解讀，只要係黃皮膚黑頭髮，就是中國人了。

以上這些分類，一或從入境政策出發，一或從國籍出發，一或是居港年期出發，一或從種族問題出發，一或從種族血緣來作分隔。表面上，討論可以百花齊放。上述的爭議，只要大家能夠比較認真地，平心靜氣地就個別問題研究，相信也可以有較為深入的結果。但可惜的是，現在討論「香港人」是甚麼的時候，一或變成人身攻擊，一或變成一種任搬龍門的跳躍式討論，例如當有人在討論永久居留權之時，就有人站出來批評，認為應該討論國籍。但有時候，當大家在討論國籍時又忽然要討論種族。於是，討論「香港人」時，就會出現三個議題交叉討論，形成泥漿摔角，意義不大。

造成這種混亂的狀態，在於討論「香港人」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迴避討論中國。正因為「香港人」是依附在「中國」而產生出來的相對概念，導致在討論「香港人」的時候，其實是在討論中國。而往往論者對中國，特別是青年網上論者，一般都帶有極端厭中、抗中以及反中情緒。於是，「香港人」的討論，很多時是處於一種不斷挖掘的狀態，以至有時甚至要誇大「中國」如何不堪，以襯托香港人如何優越。在此情況下，只要論者稍為指出「中國」可能或未必如此不堪時，就會在網上遭到攻擊，甚至被質疑其「香港人」的身份。

另一個原因在於，社會上有部分人即使很嚴肅地認為，真「香港人」的身份，是需要以居住年期來劃分的，但究竟七年是足夠還是不足夠呢？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例如七年要求，是否不足以「認證」其真的成為香港人之時，政府是否需要該名人士參加公民考試，確保他是真香港人呢（網上已有人提出類似觀

點）？又例如七年不夠長，是否需要延至十年，十二年又或者十五年呢？亦有人認為，七年可能太長，令部分有意成為真香港人的專業人士卻步，是否在符合某些條件（包括學歷、工作性質以至收入）下，讓他們可以彈性地縮短年期呢？

這個住滿七年才是永久居民的要求，其實是相當事務性的，牽涉的不止是擁有永久居民的資格，更包括受到居港年期限制的福利政策，例如輪候公屋，又或者是公務員政策，例如投考政務主任，甚至是政治權利，例如參選特首等。所以，當社會有部分人士覺得，年期是用來分辨真/假·香港人時，也應一併提出這個伸延出來的政策問題應如何解決。

另一方面，社會上亦有部分人士認為，以種族來分辨香港人，並不適當。因為香港的種族分佈上，華人是佔了大部分，但亦有在香港生活了很多代，亦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少數族裔。有些印度人幾代都在香港生活，其廣東話亦流利得不得了。於是，真/假·香港人的爭論，不應停留於某些人是否懂得說港式廣東話，是否願意學習廣東話，又或者是否懂得繁體字等，而是應該用價值來分辨，說得最多的，就是某些人是否願意認同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例如自由、民主和法治等。只要認同這些價值，他就是真·香港人。

這個方法，表面上是迴避了種族問題，較容易取得社會大部分人支持，而且更有能力取得跨族群的支持，是真·香港人的最大公約數。但是說到底，香港社會價值的意涵是甚麼，還沒有定案，這方面可能已經「有排拗」，更遑論所謂的核心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每個人的理解與演繹各有不同。今年的立法會選舉論壇，幾乎每個候選人都支持核心價值，都說支持民主及法治等。表面上，這種「價值認同」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包含了大部分香港人，但是，去到具體操作，例如筆者相信，建制派政團候選人心目中的法治觀念，與泛民背景的政團候選人的法治觀念，一定有極大差別。這種差異，牽涉到選情，兩批支持者必然會突出雙方價值觀上的分歧，難道泛民或建制，都不可以說是香港人嗎？兩派人士總不能說，因為大家對某些價值的內涵有差別，就批評對手是假·香港人，我方才是真·香港人吧？

因為，我認為有關真/假·香港人的爭議，應該回到原點，像剝洋蔥一樣，由外到內，層層推進地思考。首先要問自己，甚麼是香港人？為甚麼我們這一群人，可以聲稱自己是香港人呢？香港人的意涵是甚麼？香港人為甚麼要分真與假呢？

同一時候，我們也要睜開眼睛，理解影響真/假·香港人的其他因素，特別是長期依附著的中國因素，不能教條式地批評中國而拒絕與之聯絡及溝通。現實是，香港只是龐大的中國裡面，其中一個城市而已，中國內部，很多時都不會以「中國人」來分辨你我，反而會用籍貫來分辨你是上海人或北京人等。在此大環境下，說到香港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民族建構過程時，可能已經有人笑到人仰馬翻了。

至於近幾年有關香港人的爭論，說到底也是身份認同政治走入了主流政治的論述，那就不是本文討論之列了。

# 也談「香港人」



香港作家  
陳冠中先生

曾有論者說，凡是講究溝通倫理的公共領域討論，皆負有兩種責任，一是尋覓共識的責任，二是移情他者、聆聽陌生聲音的責任。溝通這種行為，用的是語文，而語文也具有兩種功能特性，一是語言哲學所說的行為協調，二是現象學所說的揭示世界或去蔽世界。這次談「香港人」，我希望建能夠盡量兼顧兩種責任與語文功能。

這樣看「香港人」三個字，雖非古已有之，卻因循史地特殊路徑，天時地利人氣運動，渾然在上世紀中萌芽、世紀末開花、本世紀初結果，成了有複雜內涵的名詞、有豐富聯想的形象，對內對外方便描述，利便溝通，甚至讓人情動，促人行動。若讓小我歸屬其中，添了身分，可生出後設族群，共襄公益義舉、共度時艱，以至甚或同仇敵愾，真是一個有情、有漏、豐滿而動人的名相。明明是一樣米養百樣人，有難以調和的差異，卻似兼有不能言窮的共通，值此風雲際會，營造出幾近不言而喻的集體想像，一種你懂我懂的主體間默契，其中有愛有怨，容易因誤會而包容、理解而分裂，安心立命乎，信者得救，同舟共濟乎，大話西遊。一旦企圖劃清界線分清我他真偽愛港賣港，就呈熱血部落化傾向，放言表演，「香港人」對「香港人」，頡頏忿爭，大傷和氣。故淺思之，「香港人」乃同質凝聚的存在，深察之，則見異質離合的嬗變。

華民、香港同胞、香港居民、香港市民，甚至港人等說法，皆普及在「香港人」之前，但到了近年，裏外人士都很習慣直接使用「香港人」三個字，這對溝通來說倒也方便，只要不做太多聯想。這幾個說法的協調行為與揭示世界的功能並不一樣。「香港人」三字得到日常用語的承認已經是本地人身份的一種勝利。「香港人」一旦登上歷史舞台，就如這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三個字和「中華民族」四個字在舉國建構下而實質化一樣，是不會一下子消失的。

香港民法是先於「香港人」成形的，有了香港定居者的法理定義在先，然後才終於與「香港人」三個字等同，法理香港定居者成了香港人最大的共性，以至絕大程度上(例外見下文)，有合法香港長期居留權的，都是香港人。

這個法理定義，跟個人主觀上是否認同香港、是否擁抱香港核心價值都無關。

你可以不懂香港歷史文化方言，你可以在民調裏說自己不是香港人而是中國人或外國人，甚至公開說你不愛香港，但你依然可以是香港合法定居者。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申請成為香港居民的，到了香港也不會自動成為香港人，做香港人是有法定條件的。但只要你是合法長期定居者，沒有人能夠不承認你的香港人身份。族裔、原居地、語言、宗教、職業、到港時間、歸屬感、個人價值觀可以各異，但都不妨礙你在香港長期安居樂業，以香港人身分做人。這是香港人的共享基本點。

法律在法治地區是能夠協調行為的語文，這個法理香港人的定義至為關鍵。或許這是香港最重要的共識之一。

法理香港人有沒有可爭議的例外？持單程證來港者也是擁有合法長期居留權的香港人，為什麼他或她們要住滿七年才可申領供旅行用的正式香港護照本？居港的外勞，是合法居民，可以通過續約在香港一住多年，卻不被視為長期定居者。條件是可以變的，譬如1980年取消「抵壘政策」就改變了合法居者的條件。這裏的重點是：一個法治地區可以用兩種責任和兩種語文觀的角度檢討調整對長期定居者的法律定義，但在修法之前不用說一切得依法。

上文說到法理香港人的共享基本點和法治地區，這裏需要談一下「公民」：

也可以說香港的合法定居者都是香港公民，法治自由憲政地區的所有合法長期定居個體，「自動」地、「消極」地享有當地的法定普遍公民權，不受歧視，這也是香港可貴之處。不過香港關於合法定居者的法理觀是個人化的，基於個體，連帶著直繫家屬。個體不是群體，法治地區的消極公民要成為共和式憲政共同體的積極公民，需要思想行為的一個跳躍，這可不是全由法律促成的，更不是天然的，其中涉及朝野長期的公民教育與實踐，以行為協調與揭示世界的公共語文對個體進行改造。香港作為一個公民共同體是建構演進出來的，是一個轉化定居者為積極公民的培育過程。

一般也可以說香港公民就等於香港人，我也支持公民憲政的基本理念，覺得這是一種可以協調行為的負責任論述。我甚至認為，要鋪墊港人治港的高度民主自治，公民憲政應是最穩妥的政治觀念。問題是現下不同的部落呼喚著公民以外的族群意識形態，出現爭奪「香港人」三字定義的各種本土/愛港的對立想像。

「香港人」三字確實是帶有溢出「香港公民」四字的更豐富聯想的，公民憲政主義者也會承認「人民」、「民族」這類族群字眼，爆發的動情與協調行為 -- 卻容易遮蔽陌生聲音與排斥他者 -- 的能量，在一些歷史拐點上可以超過「公民」。

「香港人」三字，遂既有日常用語中的薄含義，也有各種集體想像中的厚含義。

在大陸，不待我張口，就會有人問我是不是香港人，我當然說：是的（不用補一句「中國香港人」）！有時候也會有人問：你是新加坡人麼、台灣人麼？我立即矯正：不、不，我是香港人！這是日常用法，一般只指涉薄含義，或許帶著一點點的聯想，但主要是為了方便描述以達到溝通的目的。

經過多年磨礪，「香港人」三個字現在已很順口順耳，本地長期居民很少不以香港人自居的了。同時，這三字承載的含義添加了厚度，情緒的投放更加複雜，難免也越來越沉重。

現在的問題已不再是香港人缺乏本土認同或不懂得回饋奉獻，而是一種不僅限於在香港發生的現象的發酵泛濫：對自己的地方、歷史、文化、政制與「人民」的「本質」，作出偏食、偏執的族群解讀，並且產生「崇高」之幻覺 -- 崇高感來自對一些貌似比自己更龐大宏偉但卻無從客觀把握的想像對象的過度認同。同構的例子是各個粉絲部落對自己偶像的崇拜。這從網上一些（並非全部）政治化部落之間的相輒，以及與鄰區網民的互噴，都可以看到極致的例子：罵戰雙方持截然相反的社會想像，各有神聖崇高的認同對象，都很偏食、偏執，把自己的「本質」簡化為ABC，把對手的「本質」化約為XYZ。

因為「香港人」三字的動情能量，厚含義的各自表述，大家多在公共領域交流討論是有必要的：揭示世界、移情他者、協調行為、尋覓共識。

# 誰是「新移民」？解構五大迷思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蔡玉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研究助理陳沛雯

我們常常在網絡、報章、電視裡看到近年來港定居的「新移民」愈來愈多的說法，這些論述多按每天一百五十個單程證限額，計算「新移民」「湧入」香港的人數，並利用此數據製造香港「淪陷」的憂慮。這憂慮亦來自「新移民」在媒體上的四大刻板形象：一是一學歷低、二是沒有經濟貢獻、三是需要依賴社會福利維生，四是「新移民」多是「不道德」的女人，以「假結婚」來換取香港居留權。不道德指控的背後亦假設了中港跨境婚姻中的大陸妻子是這些婚姻問題的罪人。本文章以數據解構及呈現媒體上刻板定型以外的「新移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群體。

## 迷思一：「新移民」「湧入」香港？

與傳媒描繪的「新移民」湧港論述恰恰相反，雖然以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配額計算，每年應有約54,750名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但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自一九九八年至二零一五年這十八年期間，只有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及二零一二年的單程證配額是被用盡的。在其餘十二年，每年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目都明顯低過配額最高限額。在二零零七年，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只有33,865名，即平均每日只有大概105名持單程證人士來港。而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目佔本港人口百分比在過去十八年，都未曾超出百分之一。即使在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目最多的二零零零年，55,615名有關人士只佔該年全港人口的0.83%。這每年不足百分之一的「新移民」增長，很難說是「湧入」香港。下表為近年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目及所佔全港人口的百分比：

表一：1998年4月至2016年3月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目及所佔全港人口的百分比

年份	持單程證來港人士	香港人口（年終）	百分比（%）
1998 (4至12月)	35,966	6,583,400	0.55
1999	48,388	6,637,600	0.73
2000	55,615	6,711,500	0.83
2001	53,655	6,730,300	0.80
2002	45,234	6,725,800	0.67
2003	53,507	6,764,200	0.79
2004	38,072	6,797,700	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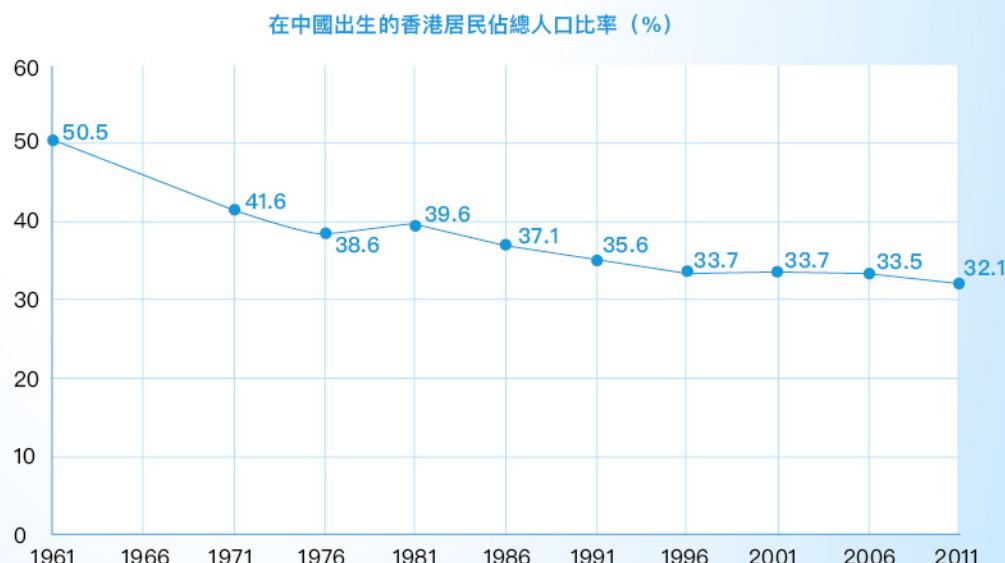
表一：1998年4月至2016年3月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目及所佔全港人口的百分比（續）

年份	持單程證來港人士	香港人口（年終）	百分比（%）
2005	55,106	6,837,800	0.81
2006	54,170	6,904,300	0.78
2007	33,865	6,938,400	0.49
2008	41,610	6,963,900	0.60
2009	48,587	6,996,400	0.69
2010	42,624	7,052,100	0.60
2011	43,379	7,112,400	0.61
2012	54,646	7,177,900	0.76
2013	45,031	7,221,800	0.62
2014	40,496	7,112,400	0.57
2015	38,338	7,266,500	0.53
2016 (1至6月)	26,050	7,324,300	0.36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總署<sup>1</sup>；全港人口數字來自香港社會指標網頁及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在五十年代，因戰亂和中國政局不穩，大量難民從中國各地逃到香港。香港很大部分的人口來自這一代的移民，他們在香港生兒育女，以香港為家。下表是內地出生香港居民佔香港歷年總人口的比率：

圖一：1961至2011年香港在中國內地出生人口（%）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1961年人口普查》；政府統計處，1966、1976及1986年《中期人口統計》

<sup>1</sup>有關資料可參考民政事務總署網頁：[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surveys.htm](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surveys.htm)

既然內地來港移民的數目佔總體人口的比例其實自六十年代至今一直下降，那麼他們「湧入」的恐懼及印象又從何而來？早期的移民來港後在港建立家庭，工作，落地生根。隨著時間過去，在我們對香港人的想像中，他們儼然變成「自己人」，脫離移民行列，成為香港的一份子。因此數目再多，也不應被視為威脅。但隨著本港反移民情緒日益增加，尤其是近這五六年，移民就彷彿被凝固成為永遠的他者——無論他們已在港定居多少年，他們也是外人，是永遠的「新移民」。政府一般討論「新移民」以居港未滿七年為分水線，但在近一兩年，本文作者不下一次看到坊間、主流媒體及社交媒體在討論「新移民」的數目時，把自九七年後來港的一併算入內。但至二零一五、一六年，九七年來港的移民不是已在港居住了十七、十八年有多嗎？為什麼他們還是「新移民」？唯一的解釋是，他們的「新」，源於我們不願意讓他們融入，成為香港社會的一份子。如果來港移民因反移民情緒而被凝固成為永遠的他者，沒有一個可脫離被視為移民的路徑或出口，隨著時間的過去，那麼他們的數目當然好像越變越多。

## 迷思二：「新移民」學歷低？

內地新來港人士不但漸被凝固成為永遠的他者，他們亦背負著多重的刻板印象，其中之一就是學歷低，縱然實際上，他們的學歷比起早期移民平均有顯著增加。誠然，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相比全港人口，來港定居未滿七年的中國移民之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前者共有接近六成人口最高學歷為高中及以上，後者只有略多於四成人士擁有該學歷。下表為十五歲以上內地來港定居未滿七年人士和全港人口的教育背景：

表二：2011年十五歲以上內地來港定居未滿七年人士和全港人口之最高教育程度比率

	內地來港定居未滿七年人士 (%)	全港人口 (%)
未受 / 學前教育	1.8	6.5
小學	13.2	16.7
初中	41.0	17.6
高中	28.0	31.4
專上教育	16.0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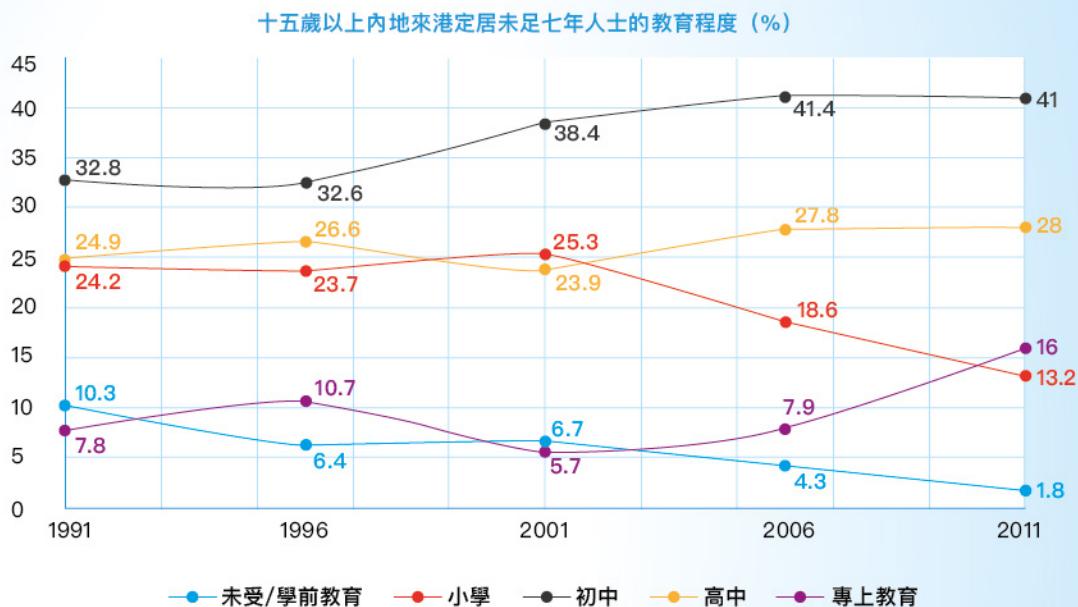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

但未曾接受教育或只接受過學前教育和只有小學學歷的比率加起來，卻是全港人口的比率相對比來港定居未滿七年的中國移民為高，分別是23.2%和15%。

而且，「新移民」的教育程度正在轉變。我們進一步比較一九九一年和二零一一年來港定居未滿七年的中國移民（十五歲以上）之教育背景，他們當中未曾接受教育或只有學前程度的，在一九九一年有10.3%，在二零一一年大幅降至1.8%；同一

時期內，只有小學程度的中國移民由24.2%跌至13.2%。反之，完成初中學業的中國移民則由32.8%升至41.4%；完成高中學業的由24.9%升至28%；完成專上教育的亦由7.8%升至16.0%。總的來說，在一九九一至二零一一年這二十年間，中國移民的教育程度一直上升，他們當中大部分至少擁有初中或以上學歷。下圖展示了近年「新移民」群體教育程度的提升：

圖二：1991至2011年十五歲以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的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1年及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滿七年人士》

### 迷思三：「新移民」沒有經濟貢獻？

另一「新移民」背負的刻板印象是他們沒有經濟貢獻，但數字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按二零一一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內地來港定居未滿七年移民的勞動人口參與比率在15至44歲各組別都比全港人口的普遍為低，這個現象很大原因是由於很多內地來港未滿七年人士為嫁予香港男性的女性，需要照顧未成年子女而未能投入勞動市場。當他們不用照顧年幼子女時，內地來港未滿七年人士參加勞動力市場的比率與全港勞動人口相比，相差很少。例如，在45至54歲這組別中，內地來港未滿七年人士與全港勞動人口的勞動市場參與率只相差3.2%；到了五十五歲或以上的年齡組別，內地來港定居未滿七年的移民更比全港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高出5.6%。下表記錄了有關資料：

表三：2011年十五歲以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和全港人口之勞動人口參與比率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 勞動人口參與比率 (%)	全港人口 勞動人口參與比率 (%)
15 – 24	30.4	40.4
25 – 34	44.9	85.7
35 – 44	56.2	79.8
45 – 54	71.8	75.0
55以上	33.4	27.8
合計	47.8	57.9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

事實上，內地來港未滿七年人士在44歲以下的年齡組別多為料理家務者和學生。例如在二零一一年，有五成內地來港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為料理家務者，差不多三成是學生，比全港人口中的兩成為多。料理家務是無償工作，但並不代表料理家務者所做的工作沒有價值，對社會沒有貢獻。恰恰相反，絕大部份的社會早已承認家務料理是一種工作，且對維持社會、家庭及個人的延續及生存有莫大貢獻。內地來港定居未滿七年人士未能投入勞動力市場，很大程度與他們沒辦法透過社會支援（如祖父母幫忙照顧）或是市場途徑（如聘請外傭）解決育兒問題。這些內地來港人士，例如與香港男士結婚而來港的女性，缺乏社會支援的主因是由於她們的移民身份，通常與娘家分隔中港兩地，因此未能動員娘家親人幫忙照顧孩子。至於他們未能透過市場途徑解決育兒問題，這當然又與跨境家庭中丈夫的收入比與本地女性結婚男性的普遍要低，以及新來港人士即使加入勞動力市場，工資亦普遍較本地出生人士為低相關。至於學生，教育當然是一項社會投資，讓學生學習知識和技能，增加其未來的勞動資本，好使他們將來能為社會帶來更大的經濟貢獻。下表為近年來港定居未滿七年的中國移民和全港人口之非經濟活動參與比較：

表四：1991至2011年十五歲以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和全港人口（十五歲以上）之非經濟活動參與率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		全港人口	
	料理家務者 (%)	學生 (%)	料理家務者 (%)	學生 (%)
1991	56.2	24.5	40.5	21.1
1996	61.4	19.4	38.1	20.8
2001	57.9	27.0	33.6	20.9
2006	60.2	23.9	27.8	19.6
2011	50.2	29.0	22.2	19.5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一年及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

事實上，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二零零九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sup>2</sup>，57.1%的受訪「新移民」婦女認為照顧小孩妨礙他們外出工作，66.7%的受訪者認為求職時最常遇到的困難是需要照顧家中的年幼子女。對於面臨人口老化、生育率低的香港，孩子於未來無疑有助補充社會勞動力，保持香港經濟的活力。

而且，二零一一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他們的年齡中位數約為31.5，而香港本地人士的則約為42.3；當中有20%少於十五歲，18.3%年約十五歲至二十四歲，分別高於全港人口相同年齡組別的12.1%和12.6%。年輕的內地來港人士長遠能夠紓緩社會勞動人口老化的壓力。

除了單程證，中國移民亦可循「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等來港定居，在二零一一年共有17,819人通過這些計劃來港定居（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4）。這些移民的勞動參與率一般較整體人口為高。

#### 迷思四：「新移民」都「擺綜援」？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涉及新來港不足七年受助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個案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四年間由24,265宗緩升至40,510宗，由佔整體綜援個案的10.5%升至14.1%。自二零零五年起，這些個案開始減少，由37,454宗降至二零一四年的13,551宗，其在整體綜援個案中所佔比率則由14.6%減至5.35%。綜合這些數字，平均每年涉新來港不足七年受助人的綜援個案只佔整體綜援個案8.9%，這不足十分一的百分比說明了「新移民」絕對不是香港社會福利的主要用家。下表記錄了近年綜援個案數字的變化：

表五：2004至2014年綜援個案數字

	涉新來港不足七年受助人的綜援個案	整體綜援個案	在整體綜援個案中所佔比率 (%)
1999	24,265	230,681	10.52
2000	24,615	228,060	10.79
2001	29,124	241,673	12.05
2002	36,023	266,571	13.51
2003	40,510	290,206	13.96
2004	41,571	295,694	14.06
2005	37,454	298,011	12.57
2006	31,952	295,333	10.82
2007	24,454	288,145	8.49
2008	20,144	284,569	7.08
2009	17,921	289,139	6.20

<sup>2</sup>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09，《新移民婦女就業情況及困難調查報告》。

表五：2004至2014年綜援個案數字（續）

	涉新來港不足七年受助人的綜援個案	整體綜援個案	在整體綜援個案中所佔比率（%）
2011	12,264	276,710	4.43
2012	10,643	269,239	3.95
2013	9,540	260,774	3.66
2014	13,551	253,054	5.35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8，《香港統計月刊：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七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政府統計處，2015，《香港統計月刊：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四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

由二零零四年起，社會福利署規定居港少於七年的市民不合資格申領綜援，惟署方可酌情向有關人士批出綜援金，至二零一三年下旬，法院裁定這規定違憲，要求社會福利署將申領綜援的資格回復至二零零四年前的規定，接受居港滿一年人士之綜援申請。有關法例修改後，來港不足七年領取綜援的個案在二零一四年只微升至5.35%，當中，有39.4%及20.2%分別屬單親及長者，需要社會保障的支援，這實難說「新移民好吃懶做依賴綜援」。

### 迷思五：「新移民」都是「壞女人」？

近年，很多被媒體高調報導的家庭悲劇均與中港婚姻有關，每當傳媒報導這些案件時，多將焦點放在妻子的內地來港身份，仁慈一點的評論就將矛頭指向港夫與內地妻子的年齡差距，並假設年齡差距是造成這些家庭糾紛的成因。其他報導就將矛頭直指內地妻子「缺乏道德」，認為是這些缺乏道德的女性造成跨境婚姻的問題。但據本文其中一位作者多年來的研究發現，雖然與雙方同是本地出生的夫婦相比，跨境家庭（定義為在結婚時妻子在內地居住，而丈夫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確有較高機會發生夫婦衝突、丈夫向妻子使用肢體暴力及性暴力等問題，但造成問題的成因並非如傳媒報導般。

首先，在國際學術期刊*Journal of Family Issues*的一篇論文指出，蔡玉萍及張家樂已發現家庭經濟壓力，而非夫妻年齡差距，是造成跨境夫妻比本地夫妻較容易發生衝突的原因<sup>3</sup>。第二，在另一國際學術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蔡玉萍、張越華及張家樂的研究亦發現，雖然相較雙方都是香港出生的夫婦，跨境夫妻較容易發生丈夫向妻子使用肢體暴力及性暴力的問題，但造成問題的成因主要是家庭經濟壓力，以及丈夫和妻子缺乏社會支援網絡<sup>4</sup>。跨境家庭的問題其實是個階級問題——因為回內地娶妻的香港男性相對於與本地出生女性結婚的男性而言，普遍來自社會經濟背景較差的一群，面對較大的經濟壓力，同時社會支援較少，而這些丈夫的社會弱勢亦是造成跨境家庭問題的主因。這與傳媒動輒就將中港家庭問題的矛頭指向內地來港女性的「道德缺失」相差很遠。

<sup>3</sup> Choi, S. Y. P. & Cheung, A. K. L. 2016. Age Different and disadvantaged: Age and financial stress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available at <http://jfi.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6/06/03/0192513X16653436.full.pdf+html>)

<sup>4</sup> Choi, S. Y. P., Cheung, Y.W., Cheung, A. K. L. 2012. Social Isolation and Spousal Violence: Comparing Marriage Migrants with Local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 444-461.

## 結語

近年，學術界關於種族問題及移民問題的討論，其中一個重大思考——究竟是黑人造成種族問題，還是種族主義造成黑人的問題？同理，究竟是移民造成移民問題，還是反移民制度、政策、論述及政治動員將移民變成一個問題，亦使他們的處境變成一個問題？

本文指出的是反移民想像及論述與現實間的一個鴻溝，這大概可作為一個起點去思考上述的問題。

## 參考資料

- Choi, S. Y. P., Cheung, Y. W., Cheung, A. K. L. (2012). Social Isolation and Spousal Violence: Comparing Marriage Migrants with Local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 444-461.
- Choi, S. Y. P. & Cheung, A. K. L. (2016). Age Different and disadvantaged: Age and financial stress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available at <http://jfi.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6/06/03/0192513X16653436.full.pdf+html>)
- 政府統計處 (2002)。《香港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香港：政府統計處。取自：<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342001XXXXB0100.pdf>
- 政府統計處 (2007)。《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結果》。香港：政府統計處。取自：[http://www.bycensus2006.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962/fb\\_key\\_findings\\_06bc.pdf](http://www.bycensus2006.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962/fb_key_findings_06bc.pdf)
- 政府統計處 (2008)。《香港統計月刊：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七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香港：政府統計處。取自：<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0808FB2008XXXXB0100.pdf>
- 政府統計處 (2011)。《香港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香港：政府統計處。取自：<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612012XXXXB0100.pdf>
- 政府統計處 (2015)。《香港統計月刊：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四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香港：政府統計處。取自：<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509FB2015XXXXB0100.pdf>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09)。《新移民婦女就業情況及困難調查報告》。香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取自：[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new.../ni\\_women\\_2009\\_3\\_8.doc](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new.../ni_women_2009_3_8.doc)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4)。《致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新移民人口政策意見書》。香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取自：[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new\\_immigrants/immigration/submission\\_2014\\_2\\_2\\_0.pdf](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new_immigrants/immigration/submission_2014_2_2_0.pdf)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6)。香港社會指標－基本統計數據。取自：[http://www.socialindicators.org.hk/chi\\_indicators/basic\\_statistics](http://www.socialindicators.org.hk/chi_indicators/basic_statistics)
- 民政事務總署、入境事務處。《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取自：[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surveys.htm](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surveys.htm)

## 作者簡介：

- 蔡玉萍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包括人口遷移、社會性別及家庭等相關課題。她亦是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
- 陳沛雯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畢業生，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助理，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性別及性慾特質、公民社會組織等議題。

# 「溝淡論」站得住腳嗎？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葉健民教授

「反蝗論」其中一個極端的觀點，是中共刻意以大量大陸移民湧入香港，以「溝淡」港人成份，並透過選票數目的不斷增加，逐漸控制香港政局。這種論調，背後假設了移民是一個由上而下精心策動的政治策略，而非個人選擇，但這與單程證來港人士總體依然以家庭團聚為主的事實，並不符合。但有人會反駁，即使移民不是中共精心設計的殖民手段，但來自大陸的人由於成長經驗，價值觀往往有異於土生土長的港人，也不會認同以中港矛盾為動員主軸的泛民政黨，始終會較傾向於支持親中政黨，自自然然會成為他們的票倉，客觀效果上，也會助長了北京在港的政治影響力。

究竟新移民是否必然是親中政黨的「鐵票」來源？他們的政治觀點又是否和土生土長的「真香港人」截然不同？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和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於二零一四年進行了一次地區調查，訪問了近千名人士，並運用調查所得的數據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我們把調查對象分為四組：本地出生人士、來港一至三年的大陸移民、來港四至六年的大陸移民，和來港十年或以上的大陸移民，對比他們在近年社會重大爭議中的態度，以印證新移民必然親近親中政黨的說法。

從表1的數據來看，有幾點值得深思：

第一，在大部份爭議中，本地出生人士確實與大陸移民在取態上有明顯分別，當中以純政治議題如爭取普選行政長官、平反六四、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支持比率，平均差距有近20個百分點。在涉及有中國因素的大型基建爭議上，差別雖然略為收窄，但四組人士的分歧依然明顯；

第二，在純民生議題上，如爭取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保問題上，四組人士態度卻近乎一致，而這些議題均為泛民政黨與親中政團如工聯會所重視；

第三，雖然本地出生人士與大陸移民在多數問題上的取態有明顯分歧，但若細心比較三組來港年期不同的大陸移民的立場，卻可以看出一個頗為一致的規律，就是居港日子越長，移民的取態會與本地人越接近；

第四，大陸移民在大部分問題上沒有意見或「一半一半」的表態比率遠高於本地出生組別，除了首兩項民生議題外，差不多在每項爭議中都有四成以上舉棋未定，立場飄忽。

這些初步的分析顯示，雖然大陸移民與本地出生人士在很多問題上立場並不一致，但這些來自大陸的人士大多對社會議題態度開放，可塑性強。同時，他們也可能會受本地社教化過程影響，隨着歲月，逐漸拉近與本地人思想上的距離。

但是，在政治現實中，大陸新移民又是否與親中政團較為親密呢？從表2可見，內地移民對親中政團如民建聯和工聯會的欣賞程度，雖然略高於對泛民政黨，如民主黨和公民黨的評價，但他們和本地人在取態上的差距，最多也只在10個百分點以內。更重要的啟示是，七成以上具內地背景的受訪者，並沒有明顯的傾向去支持任何一個政黨，更談不上是親中政團的鐵桿支持者。表3的數據，也進一步說明即使內地移民較為欣賞民建聯，這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些數字顯示，並不是所有新移民初來埗到，便馬上與親中政團一拍即合。反之，來港三年以內的新移民對這些政團的認同程度，其實和土生港人十分接近。換言之，就算是愛國政團，也需花盡心力去贏取這些內地移民的歡心。純粹因為他們出身的背景，去斷言內地移民必然會支持親中政團的說法，並不成立。

民建聯何以能在爭取內地移民支持上有較好的成績，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因為「蛇齋餅粽」策略有效，也有人相信是內地出生的民族觀念、政治價值觀和成長經驗，令他們更靠近愛國團體。

政治認同固然受到多個因素影響，政治資訊來源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而當中又以媒體的影響至深。因為媒體如何去報導、講述和分析新聞故事，對相關的「社會事實」如何呈現在大眾眼前有直接影響。但從表4的數據來看，本地出生的人士與內地移民的選擇極為相似，就是兩者均十分倚靠本地媒體提供的資訊去理解社會事務。不論是本地出生抑或來自內地，最多人閱讀的依然是《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而在兩個群組中，均沒有人表示會經常閱讀《大公報》和《文匯報》這類中央宣傳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內地移民確實較本地出生人士更多透過瀏覽內地互聯網取得時事訊息，但這個比例始終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

總的來說，不管受眾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還是新來港的內地人士，都主要依賴本地媒體去了解政治，從類近的途徑去接收時事訊息。在一定程度上，泛民和親中政黨，至少可以在相同的平台上一較高下，爭逐民情。

## 結語

所謂「人口赤化論」，認為大陸移民是民主天敵的說法，並未得到是次調查結果所支持。相比泛民政黨，親中陣營自然有各種優勢去取得內地移民的支持，但這並不意味他們便是民建聯和工聯會的「天然粉絲」。他們與愛國組織看似情投意合，當中其實存在一個爭取的過程。而他們的政治立場，亦可能會隨著生活經驗與土生土長的港人越走越近。新移民會因應個人經驗、朋輩影響以至社會輿論去判斷，哪個是最關心和重視他們利益的政黨。任何政黨都必須努力耕耘，才有收獲。

表1：對不同社會議題的取態

	本地出生 (樣本數目 = 306)			大陸移民 – 來港少於7年						大陸移民 – 來港10年或以上 (樣本數目 = 141)		
				來港1至3年 (樣本數目 = 302)			來港4至6年 (樣本數目 = 177)					
	支持/ 非常 支持 (%)	不支持/ 非常不 支持 (%)	一半 一半/ 沒有 意見 (%)	支持/ 非常 支持 (%)	不支持/ 非常不 支持 (%)	一半 一半/ 沒有 意見 (%)	支持/ 非常 支持 (%)	不支持/ 非常不 支持 (%)	一半 一半/ 沒有 意見 (%)	支持/ 非常 支持 (%)	不支持/ 非常不 支持 (%)	一半 一半/ 沒有 意見 (%)
1.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68.3	7.9	23.8	70.4	3.1	26.5	70.9	5.0	24.1	72.3	8.5	19.2
2. 爭取標準工時立法	75.1	7.2	17.7	72.7	5.4	21.9	73.2	6.1	20.7	74.5	10.6	14.9
3. 反對發展新界東北	30.1	34.0	35.9	12.7	34.8	52.5	15.7	39.1	45.2	26.2	33.3	40.5
4. 反對興建港珠澳大橋	20.9	39.8	39.3	7.5	41.2	51.3	9.3	48.7	42.0	15.6	44.6	39.8
5. 反高鐵	18.3	45.4	35.3	5.6	51.2	43.2	10.9	50.3	38.8	17.0	47.5	35.5
6. 反國民教育	38.9	28.8	32.3	14.5	29.2	56.3	17.0	31.1	51.9	24.1	31.9	44.0
7. 反對23條立法	37.3	19.6	43.1	12.2	22.6	65.2	16.2	22.6	61.2	27.6	17.0	55.4
8. 爭取普選行政長官	63.1	9.8	27.1	41.6	11.4	47.0	40.5	13.3	46.2	57.5	12.7	29.8
9. 反對中港融合	30.4	25.2	44.4	15.3	33.3	51.4	21.6	34.4	44.0	22.0	36.8	41.2
10. 平反六四	46.4	7.8	45.8	20.0	14.6	65.4	28.9	13.6	57.5	38.3	14.2	47.5

表2：若果要挑選一個你最欣賞的政黨/政治團體，你會挑選哪一個？

	香港出生人士 (樣本數目 : 306)	內地移民 (樣本數目 : 723)
民主黨	4.6%	2.3%
公民黨	2.3%	2.3%
民建聯	4.9%	13.5%
工聯會	1.6%	3.2%
其他	8.5%	7.3%
沒有一個欣賞的政黨/政團	64.1%	43.9%
不認識任何一個政黨/政團	14.1%	27.5%

表3：不同居港年期的內地移民及香港出生人士欣賞的政黨/政治團體

	香港出生人士 (樣本數目：306)	內地移民 (居港3年或以下) (樣本數目：177)	內地移民 (居港10年或以上) (樣本數目：141)
民主黨	4.6%	0.6%	1.4%
公民黨	2.3%	1.7%	2.1%
民建聯	4.9%	3.4%	17.0%
工聯會	1.6%	1.7%	4.3%

表4：過去一年，你主要以哪種途徑得到有關社會事務/本地政治的資訊？

	香港出生人士 (樣本數目：306)				內地移民 (樣本數目：723)			
	是	否	拒絕回答	總數	是	否	拒絕回答	總數
本地報章	73.5%	26.5%	0%	100%	72.4%	27.5%	0.1%	100%
內地報章	1.6%	98.4%	0%	100%	4.0%	95.9%	0.1%	100%
本地電台新聞時事節目	23.5%	76.5%	0%	100%	16.9%	83.0%	0.1%	100%
內地電台新聞時事節目	1.0%	99.0%	0%	100%	2.6%	97.3%	0.1%	100%
本地電視新聞時事節目	70.9%	29.1%	0%	100%	77.4%	22.5%	0.1%	100%
內地電視新聞時事節目	0.7%	99.3%	0%	100%	7.1%	92.8%	0.1%	100%
本地互聯網	62.4%	37.6%	0%	100%	41.1%	58.8%	0.1%	100%
內地互聯網	2.6%	97.4%	0%	100%	13.7%	86.2%	0.1%	100%

# 同工對談：前線觀察及服務反思

專訪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家庭及社區)梅偉強先生、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跨境及國際個案工作服務總監廖金鳳女士、「中港家庭權益會」組織者曾冠榮先生

不少非政府機構多年來開展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支援服務，例如教育支援、就業支援、社會福利和房屋等。站在最前線的服務提供者，他們對新來港人士的處境及形態變化有何觀察？面對中港矛盾下，有說法指出香港要停止讓內地人來港定居，面對社會氛圍的角力與新來港人士的服務需要，同工的想法是甚麼？他們如何自處？

就著以上問題，今期政策報邀請數位同工進行訪談，他們背景各異，有事奉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的牧師，有關注中港家庭權益的社區組織者，有處理跨境及國際個案工作服務的資深社工，亦有推動業界服務發展，負責政策倡議的社工。他們於訪談當中分享對新來港人士的觀察，並在現時社會氛圍下思考服務發展的出路。

訪問整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政策研究及倡議主任 黃雅怡

## 一・斷絕內地人來港定居？

最近數年，社會上有不少聲音反對內地人來港定居。然而，香港一直是一個移民城市，內地人移居到香港不是新鮮事。廖金鳳認為，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從來不能分割，每個人都有所屬的籍貫。「新來港人士狀況的變化，只反映了香港出入境政策的變化」。她認為內地人領取單程證來港定居不是回歸後才出現的現象，基本上，自港英政府取消抵壘政策後，中港政府開始逐漸推行配額制度，由1983年每日75個配額增至1993年的105個，及後在1995年再增至150個。配額制度沿用至今，150個配額主要分配給近親，60個指定給港人的內地子女、30個指定給配偶團聚，其餘配額則包括來港照顧無依靠親屬、繼承產業者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3）。

事實上，九成或以上的新來港人士均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來港。多年來，申請單程證的個案當中大多是夫妻或子女的近親團聚；而家庭團聚作為人的基本需要，是不應被忽視的。總的而言，根據單程證計劃從內地合法來港的移民，一直是移居香港人口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過去二十年本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因此，廖金鳳認為香港不能斷言不讓內地人來港定居，與家人團聚。

## 二・中港矛盾的緣起

由於出入境政策的變化包括雙程證及自由行政策的出台，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香港社會漸漸把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人，與持雙程證的流動內地居民混為一談，更因為種種原因對內地背景的人形成「鐵板一塊」的負面形象。

同工解釋，雙程證跟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性質截然不同。現時雙程證下主要有兩種簽證，一是探親簽證，不少在港育有子女的內地單親母親<sup>1</sup>以探親簽證持雙程證留港生活；二是旅遊簽證，讓內地居民以正規出入境程序來港旅遊。

可是，隨著內地旅客不斷增加，社會問題逐步衍生，包括「雙非嬰兒」、水貨客造成社區日用品供應短缺、兩地文化差異屢生衝突，曾冠榮觀察到，現時港人有感「洪流侵食香港」，「蝗蟲」、「強國人」等標籤油然而生，「整個大社會脈絡滲入了很多與社工最關注的新來港人士無關的矛盾跟衝突」，可惜在中港矛盾下，要「埋單」的卻是來港團聚的單程證人士。

曾冠榮認為，中港矛盾源自競爭，從奶粉荒、醫院婦科床位爆滿、北區學額不足問題到自由行與香港人的文化衝突，種種資源短缺現象激化香港人產生「內地人來港搶資源」的印象。梁牧師的觀察是，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排斥源於大家對共產黨的恐懼，「怕內地人把內地的一些文化帶來香港」。另一方面，傳媒及社會氣氛亦傾向將水貨客、雙非家庭、自由行旅客以及來港團聚的單程證人士混為一談，只要你是內地人，就直接跟水貨客、雙非母親、自由行、甚至來港炒高樓價的內地人劃上等號。這種媒體建構，正正忽視內地來港的流動人口，跟持單程證來港定居、資源相對上匱乏的新來港人士，兩者本質上的不同。

### 誰在建構對新來港人士質素的想像？

梁耀東牧師認為，很遺憾的是社會多年來未有展現新來港人士為香港帶來的正面價值，包括作為整體人口增長的穩定來源、補充香港日趨老化的勞動人口、家庭團聚亦可鞏固家庭功能，讓婦女擔當照顧家庭的角色，子女在完整的家庭環境成長等，這些無法計算的社會價值，如家庭凝聚力、家庭的健康發展不被正視，反而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上公屋等佔領社會資源的負面攻擊，卻不斷被放大。

媒體亦為新移民塑造負面形象。廖金鳳舉出近十多年來有關新來港人士負面印象的例子：一是1999年特首董建華「167萬人十年之內全部湧港」的言論令香港人擔心人口壓力令香港「爆煲」；二是2003年沙士疫潮時，有論述指責新來港人士衛生欠佳令沙士在社區迅速蔓延；三是新來港人士「呃綜援搶公屋」的標籤。這些報導令香港人對新來港人士心存芥蒂，只把所有新來港人士「概括化」成社會問題，並沒有基本理據，更毋視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然而，政府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港38萬個綜援個案當中，接近六成是長者，近兩成是永久性殘疾或健康欠佳，一成多是單親個案，只有不足百分之五是新來港人士個案，所佔比例極少；民政事務總署有關內地新來港人士的統計調查報告亦顯示，

<sup>1</sup> 在「單程證」批核前，因與居港之配偶發生感情問題而導致夫妻離異、或其配偶突然去世、入獄、失蹤等，而導致在內地申請一方失去申請「單程證」的資格，但其在港出生的子女卻乏人照顧，單親媽媽只有依靠「雙程證」來港照顧子女。

<sup>2</sup> 香港統計月刊(2015年9月)：2004年至2014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取自：<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509FB2015XXXXB0100.pdf>

2011至2016年期間，大部分新來港人士居住於公營房屋，三成多租住私人房屋<sup>3</sup>。換言之，基於家庭團聚而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基本上均有現居地方，跟新來港人士「拎綜援爭公屋」的描述存在差距。加上房委會要求，公屋編配時必須有至少一半成員在香港住滿七年及所有成員仍在香港居住，因此，持單程證來港人士要「爭公屋」，根本不可能。

可是，面對本土主義潮流，新來港人士一直處於捱打的狀態。曾冠榮指出，現時網上輿論一面倒攻擊新移民，為甚麼沒有新來港人士出來回應現時本土派的指控或刻薄說話？梁牧師亦留意到，新來港人士也有「自己人踩自己人」的情況出現，來港年期較長的或看不起初來港的、更弱勢的新來港人士，凝聚力的不足或影響他們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 三・政府福利規劃與新來港人士支援服務

就著業界應否創造另一股力量應對右翼的排外思潮，梅偉強認為業界需要反思這種社會風氣為何能在香港孕育生根。他覺得這現象或多或少反映本地人對內地人霸佔資源的恐懼，若追本溯源，問題源於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的資源投放遠遠比不上社會需求，而各項政策又缺乏規劃，導致資源分配不均。若矛頭不指向政府卻歸究於新來港人士，實有欠公允。

#### 新來港人士面對的服務斷層

此外，面對等待單程證審批的準新來港人士形態不斷變化，服務需要又未被正視，梅偉強指出，現時出現的服務斷層，正突顯福利規劃的重要性。但在「頭痛醫頭」、「腳痛醫痛」短視的政策方針下，政府缺乏支援新來港人士的長遠政策規劃。

回顧歷史，香港政府曾於1995年提出在內地成立四個服務中心，但後來卻未有成事，只有民政事務署推行「期望管理服務」，但服務較少提及來港生活後的支援。曾冠榮舉例，「超齡子女」於1999年人大釋法後未能即時來港，當他們在2012年取得香港身份證後已步入中年，有關的支援服務的焦點應為他們來港後的生活作準備。可是，「超齡子女」在港亦沒有住屋，加上文化各異，難以生活，惟被逼返回內地。可見，新來港人士的支援配套零散且有限，窒礙新來港人士來港投入勞動市場，亦拖慢他們融入社會的速度。

梁牧師指出，縱然新來港人士有能力，亦有向上流動的目標，但基於香港的資歷架構並不全面承認內地學歷，他們在港面對學歷及職業錯配的問題，不被認可的學歷同時影響持續進修的機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新來港人士補充勞動力」說法的背後，他們代替了香港人從事勞動強度大、低技術及低薪工種。新來港人士的人口資源該如何發展？社會對琅琅上口「勞動力」一詞，還有其他的想像嗎？

<sup>3</sup> 民政事務總署及入境事務處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取自：[http://www.had.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report\\_2016q2.pdf](http://www.had.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report_2016q2.pdf)

另一方面，準新來港人士在等待期間亦未能接受多元化的培訓及就業支援服務，他們只能光等，期間無法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當新來港人士正式成為香港居民後，亦因缺乏培訓，未能即時進入勞動市場。梅偉強建議，面對香港人口老化，對長者醫療及社會福利的需求有增無減的情況下，政府可考慮提供職業培訓予準香港人，如復康助理員、安老服務照顧員等，有助補充未來老人服務所需的勞動力。

至於那些持雙程證來港照顧香港子女的父母，現時香港並沒有社會服務支援他們。舉例來說，若這些持雙程證來港的婦女遇到產後抑鬱，她們根本得不到精神復康的支援。即使母嬰健康院可轉介個案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支援亦十分有限。就算她們回到內地，她們亦未必得到精神健康服務的支援，因此梅偉強認為，政府應考慮到她們在兩地往返的獨特需要而提供跨境支援服務。

總的而言，四位同工均認為政府需要認同新來港人士的需要，亦應在不同政策範疇上進行規劃，並投放資源提供發展性的服務，如職業再培訓服務等，並且透過實證研究呈現新來港人士為香港帶來的社會及家庭價值。

#### 四・結語

香港人對新來港人士的整體印象，基於傳媒報導及政府解說，往往是「面對很多家庭及經濟問題，又需要不少福利及服務的一群」，他們亦與由內地來港「掠奪香港資源」的流動人口劃上等號。但印象背後，服務數據及同工觀察卻有另外一個面向。「弱勢」、「社會包袱」、「呃綜援搶公屋」，是新來港人士的真實境況，還是被貼上的標籤？新來港人士在香港社會及家庭的價值，又該如何展現？

# 問卷調查

我們希望聽取你對政策報的意見。請將本版列印後填寫，並傳真至2864 2999或電郵至 policybulletin@hkcsc.org.hk。意見調查資料經收集後會用作本會統計及參考之用。

## 對政策報的意見

1. 你對政策報有何意見？(請選擇1至5分，1為最低分，5為最高分。)

	最低			最高
所選政策的合適性	1	2	3	4
分析的可讀性	1	2	3	4
內容深淺的適中性	1	2	3	4
資料的實用性	1	2	3	4
				5

2. 你認為政策報未來應包括什麼政策呢？

---

---

---

3. 你對政策報的其他意見：

---

---

---

## 背景資料

4. 你所屬的主要界別是：

- a.  政界      b.  商界      c.  學術界      d.  新聞界      e.  社福界  
f.  其他專業界別：(請註明) \_\_\_\_\_

姓名(自由填寫)：\_\_\_\_\_

聯絡電話/電郵(自由填寫)：\_\_\_\_\_

# 讀者意見

你對今期政策報探討的議題有什麼想法？歡迎讀者來信，傳真至2864 2999或電郵至policybulletin@hkcsc.org.hk與我們分享。

# 昔日政策報

瀏覽昔日政策報，可登入<http://webcontent.hkcss.org.hk/prb/Policybulletin/main.htm>

**創刊號 – 香港2012 – 特首對香港應有什麼承諾？**

**第二期 – 香港醫護融資改革：可以兼顧公平、質素、選擇嗎？**

**第三期 – 香港的退休制度 – 紿你信心？令所有人憂心？**

**第四期 – 扶貧紓困由地區做起**

**第五期 – 香港需要一個公民社會政策嗎？**

**第六期 – 市區重建**

**第七期 – 從香港勞工面對的挑戰 看勞工政策的發展方向**

**第八期 – 逆按揭**

**第九期 – 醫保以外：醫療服務質素**

**第十期 – 市民福利的社會規劃**

**第十一期 – 住房的價值：房屋政策新探**

**第十二期 – 住房的條件：房屋政策新探（續）**

**第十三期 – 「回到社會政策ABC：社會發展的道德價值基礎」**

**第十四期 – 人口發展政策 目標的思索**

**第十五期 – 少數族裔在香港**

**第十六期 – 移民政策與社會發展**

**第十七期 – 社會企業：如何推動社會創新之路**

**第十八期 – 香港好青年**

**第十九期 – 從長期護理服務看安老：政策與實踐**

**第二十期 – 香港退休保障：何去何從？**



# 促進公共政策質素 探究核心原則、價值

## 《社聯政策報》第二十一期

出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13樓

電話：2864 2929

傳真：2864 2999

網頁：<http://webcontent.hkcss.org.hk/prapolicybulletin/main.htm>

電郵：[policybulletin@hkcss.org.hk](mailto:policybulletin@hkcss.org.hk)

版權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有。歡迎轉載，惟轉載前須先取得本會同意。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香港公益金贊助